

格吕克《阿勒山》与《阿弗尔诺》中的反挽歌书写

江涵伟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当代挽歌中,美国诺奖诗人露易丝·格吕克的后现代式哀悼蕴含着深受斯多葛主义影响的冷峻。她拒绝浪漫主义式的慰藉与抒情感伤,倾覆了传统挽歌的宣泄逻辑。本文以《阿勒山》与《阿弗尔诺》两部诗集为研究对象,考察格吕克如何在私人哀悼与公共创伤之间,发展出一种具有后现代意义的反挽歌书写。《阿勒山》作为其最具自传色彩的诗集之一,集中呈现个体死亡经验;而写于“9·11”事件之后的《阿弗尔诺》,则将个体创伤扩展为一种悬置于历史与神话之间的集体哀悼形式。格吕克以刻意节制、近乎冷峻的语言风格,将挽歌重塑为一种铭刻创伤记忆的诗学实践,而非情感宣泄或超验救赎的中介。

关键词:露易丝·格吕克;哀悼;反挽歌;“9·11”;记忆

DOI: doi.org/10.70693/202607144835

一、引言

细读露易丝·格吕克(Louise Glück)的诗歌,不难发现,其诗歌语言高度凝练,“极度简朴”,或许会从中“辨识出一种苦修式的冲动”^{[1]132}。苦修(*askēsis*)源自古希腊斯多葛传统,以自我弃绝与克己节制为特征,追求精神超越。苦修哲学虽然渗透进了格吕克的诗学气质,成为其面对人类存在困境的一种本体论回应;但如果从她的挽歌切入,其旨归却又不乏含混性。

在书写家庭琐细的挽歌集《阿勒山》中,诗歌《生日》、《爱花人》与《天堂》用词极简,明显构成了一种克制的诗学实践。在此,哀伤并未被化解,而是常于缄默与含蓄之中得以存留,这样的诗学表达也与她父亲“清教徒般”反对亲密关系中表演性、伪善性的印记相吻合^{[2]182}。这种带有压抑意味的成长经验,深刻形塑并铭刻了她童年时期在家庭关系中的心理创伤。与此对照,在诗集《阿弗尔诺》中,特别是在“9·11”恐袭后迟迟写就的长诗《十月》里,格吕克延续了她克制的哀悼诗学,但更为复杂——通过借助“置换”策略,改写大量神话文本(包括维吉尔、赫西俄德、荷马与奥维德的作品),融合珀耳塞福涅、得墨忒耳与诗人自身声音生成复调人格,重新穿越了“归零地”^{[3]39}。通过冥界入口阿弗尔诺斯(*Avernus*)、历史灾难的死亡之坑“归零地”、人类裂隙的化身珀耳塞福涅,一个处于生命与死亡、创伤与疗愈之间悬置状态的共同受难空间得以建立,且始终停留在意义的困境,亦即“疑难”(*aporia*)之中,超越了历史与时间的界限。在这一阈限空间中,暴行、创伤与死亡等问题被不断延宕、悬而未决,多重意义彼此碰撞。格吕克所创设的“疑难”本身即可被理解作为一种苦修哲学:既不追求救赎,也拒绝感伤式的慰藉,而是为无法愈合的创伤保留一种记忆方式或诗性空间。

疑难的居间状态恰恰是当代挽歌运作的核心特征。在2010年出版的《牛津挽歌手册》中,卡伦·韦斯曼(Karen Weisman)同样在开篇处指出挽歌在框定失去、死亡时所创设的“悬置空间”,她认为挽歌“可以被拉扯在生者与死者的世界之间,拉扯在当下的悲痛生活与被假定为充满欢乐的逝去过往之间”^{[4]1}。这种悬置在古典挽歌中已然隐含,在当代的书写中则逐渐发展,上升为中心特征。从《阿勒山》到《阿弗尔诺》,露易丝·格吕克的哀悼诗学汇入了由贾汗·拉马扎尼(Jahan Ramazani)所阐发的当代反挽歌潮流。在《哀悼之诗——从哈代到希尼的现代挽歌》(1994)一书中,拉马扎尼指出,现代挽歌诗人倾向于颠覆传统的补偿性哀悼,使失去处于不可慰藉的状态。从心理学视角看,这种“忧郁性哀悼”的转向,背离并挑战了田园与葬礼习俗中挽歌文类的慰藉功能,可被称为“反挽歌”;但同时,它又“远非全然忧郁”^{[5]14, 26, 30}。其后,克利夫顿·斯帕戈(R. Clifton Spargo)进一步指出:“反挽歌最明确的标志,在于其拒绝从文化纪念功能中寻求补偿”^{[6]444}。在斯帕戈的视阈中,格吕克的两部诗集似乎呈现着相互矛盾的立场,但二者的分歧恰恰揭示了这一文类的内在张力。

尽管近年来格吕克的作品在学界受到大量关注,但其独特的当代反挽歌诗作仍然相对缺乏系统研究。本文试

图超越现代反挽歌倾向于抗拒慰藉、沉湎忧郁的西方学界解读,将格吕克在《阿勒山》与《阿弗尔诺》中的反挽歌书写阐释为一种居间性实践,突出格吕克的反挽歌在哀悼与表征哀悼之间的伦理张力。

二、家庭挽歌:《阿勒山》对田园哀歌传统的重塑

由赛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的第一首《牧歌》(“Idyll”)中提尔西斯(Thyrsis)对达夫尼斯(Daphnis)的哀悼开始,田园哀歌逐步发展为一种诗歌创作模式——将私人伤痛置入“宜人之地”(locus amoenus)或“绿色世界”的意象体系中,通过自然图景的象征转化达成情感慰藉,最终指向符号性的复活与超越^{[7]149}。弥尔顿的《黎西达斯》(“Lycidas”)、雪莱的《阿多尼》(Adonais)、丁尼生的《悼念》(In Memoriam)、惠特曼的《紫丁香》(“Lilacs”)——这些哀歌正典无不浸润于这一牧歌传统之中^{[8]222}。学界虽已意识到格吕克的挽歌“深度运作于田园哀歌的成规之内”^{[9]361},但其具体如何在《阿勒山》中重塑这一传统仍待进一步研究。

若田园哀歌传统仰赖自然的符号性意义,将花朵作为复活的能指、花园作为重生的场所,那么格吕克《阿勒山》则对这种符号性意义施行了决然否定。贝克(Baker)指出,格吕克的苦修诗学语言克制、刻意删削,拒斥自然意象的慰藉功能^{[1]45}。在《阿勒山》中,哀悼并非发生于传统挽歌中的“宜人之地”,而是“郊区哀悼者的逼仄居所”^{[2]179},自然在此退场。从失去到治愈的经典挽歌范式被一种止息式的坚忍修辞取代,恰恰呼应了格吕克在诗歌《劳动节》的结尾诗行:“不是一句话,只是一口气,一个停顿。”^{[10]206}。同时,曾一度承载隐喻功能的花朵意向既有的象征效力也在《阿勒山》中逐步消解。随着20世纪90年代诗学的发展演进,格吕克逐渐意识到,“花的语言已无法充分承载她的悲恸与渴望”^{[2]178}。尽管她在《阿勒山》中反复调动花的意象以书写家族记忆,但在这一诗集中,花已不再是稳固的意义载体,而转化为一个“牵涉文学权威的争议性场域”:自然是否应被据为一种“具有意义的象征体系”^{[2]179}?正是这种内在的张力、犹疑,构成了她在承继、反思乃至倾覆田园传统过程中一个关键的诗学维度。

以《生日》为例,每年送至母亲手中的玫瑰唤起“母亲美貌的传说”,这一纪念姿态原本呼应着田园传统中花井作为象征延续的载体,却戛然而止:“十年后,玫瑰不再来”^{[10]221}。花井在此非但不再象征永恒与重生,反而暴露了自身的贫乏:它们无力抵抗时间。莫里斯(Daniel Morris)精辟指出,格吕克拒斥将花井转化为可能延宕死亡的哀歌隐喻;反之,她认为沉默是更为真切的哀悼方式,是一种映照父亲情感节制的哀悼^{[2]182}。与此类似,《天堂》一诗以反讽强化对自然意象作为慰藉中介的拒斥。姐姐承袭传统哀歌角色,在园中除草蒔花,将郊区居所化为花井纪念空间:“对她而言,这像乡村——/修剪齐整的草坪,条状的彩色花朵。/她不知它曾是什么”^{[10]231}。与此相对,说话者坚持此种姿态的虚饰,意义贫乏,将自己与父亲“对情感的蔑视”结盟^{[10]230}。此中恰恰否定了田园挽歌循环重生的传统。花井的季节性绽放在格吕克的诗歌中不再是复活的隐喻,相反,是一种情感欺骗,掩盖着父位缺失这一未愈创伤。《爱花人》则更直白地呈现了格吕克的家人对花朵这一哀悼符号的拒绝:“在我们家,人人都爱花。/正因如此,墓地才如此古怪:/没有花,只有草皮的锁,/中心立着花岗石碑。”^{[10]207}在花朵惯常象征超越的传统中,格吕克代之以裸露无饰的“花岗岩石碑”。此种苦修式的简素是风格选择,也是她对于哀悼的伦理姿态,亦即通过近乎禁欲的方式拒绝将隐喻作为慰藉的手段。总之,花朵、田园、季节意象在格吕克的挽歌中被质疑、被否定,不再作为修复、重生的隐喻。格吕克对田园哀歌模式的重塑,正是通过否定的修辞完成:剥离传统自然意象的隐喻功能,裸裎悲恸的未愈伤口。

三、后9·11书写:《阿弗尔诺》对循环重生的拒斥

《阿勒山》对传统慰藉意象的质疑,为格吕克在《阿弗尔诺》中重塑的更激进的反哀歌范式奠定了基础。若《阿勒山》剥离自然的隐喻潜能而选择裸裎悲痛,《阿弗尔诺》则将此种批判推至田园哀歌所依托的循环时间逻辑。重生的写法深植于田园哀歌传统,通常以季节循环来呈现。从斯温伯恩(Swinburne)至劳伦斯(D. H. Lawrence)、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始终是现代哀歌书写的关键意象。然而,随着工业革命与都市生活的侵蚀,此种慰藉式的书写传统在当代文学语境中也渐渐松动,产生演进,对形而上的怀疑渗透进了挽歌书写。邦妮·科斯特洛(Bonnie Costello)论及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的诗歌时指出,“现代对牧歌式挽歌(pastoral elegy)的修正最显见于哀悼作品中封闭性与慰藉性的缺失,这反映了现代诗歌更普遍的偏好——暴露问题,而非解决问题”^{[9]346}。格吕克的修正恰在于对循环式重生的拒斥。古典田园哀歌通过季节回归或珀耳塞福涅等神话意象寻求符号性复活,格吕克却在重写这一原型时动摇其模式。诗歌《夜徙》中毅然开始质疑:既然“我们依赖的这些事物/终将消逝,/灵魂那时将凭何慰藉”^{[10]489?}

尽管格吕克在《阿弗尔诺》中援引珀耳塞福涅,季节母题在其反哀歌书写中已大为变形。国内学者但汉松(Dan)认为,格吕克“试图在神话的‘阿弗尔诺’和‘9·11归零地’之间建立超历史的关联,同时为生活中无处可逃的断裂与死亡提供了冷峻的诗歌见证”,但最终是为了“重塑一种当下感,规劝我们放弃对回归的情感执念”。^{[11]41}

这精当地揭示了格吕克《阿弗尔诺》对历史灾难的诗学见证，但在某种程度上，诗集《阿弗尔诺》拒斥此种具有治愈可能的时间线性。《阿弗尔诺》或许并非旨在将当下重铸为新的稳定地基；相反，它滞留于过去灾难与当下存在难分难解的悬置状态——时态的游移暗示说话者不断从当下逸入记忆又复归。统摄格吕克哀悼的苦修诗学，恰与此种解读中隐含的目的论相悖。

学界公认《十月》为诗集中最为震撼之作。《十月》由六个部分组成，前四首诗歌穿越冬、夏、春、秋的召唤，不无对自然治愈之力的古老信仰。正如贝克评论，第四首“尽管姿态从容，比济慈的《秋颂》或史蒂文斯的《星期天早晨》末章更为炽烈”^{[1]138}。然而，穿越阿弗尔努斯的神话之旅是一场无终的趋近，它持续至第五部分，成为一种滞留与延宕的苦修。所余者，似乎只是一颗在“苦涩耻辱、寒冷荒芜”空间中的思忖之心^{[10]500}。开篇数行，说话者反复质问：“难道夜没有尽……难道它们没结束，后园 / 没被耙过种过—— / 我记得泥土的触感，红而密实， / 在硬直的行垄中，难道种子没被种下”^{[10]493}，将种植与生长的循环同创伤的持存并置。问句的重复加强了对时间循环慰藉功能的质疑：纵使种子播下、季节轮回，言者身心仍不可逆地烙刻创伤。此一自然外观连续与内在创伤持存的张力贯穿全诗：第二段中，说话者观察到阳光回归，“枫树的长影 / 在碎石小径上近乎淡紫”^{[10]494}，却旋即断言：“它对我毫无用处；暴力改变了我”^{[10]495}。此处，田园更新之诺——夏、阳光、丰饶的回归——被不可逆地创伤化的意识所抵销：“暴力后的慰藉”幻象被诗人拒斥^{[10]495}。季节更新带来的慰藉已然失效，甚至转化为“剥夺我们幻象、所爱之人、之地、之物的时间暴力”^{[1]136}。尽管诗人仍召唤田园哀歌传统中的春播、夏长、秋收，其更新与慰藉功能已被剥离。在第四段中，世人仍言及“放弃希望并未摧毁你”^{[10]497}。此希望之弃绝中，生出对世界苦难的坚忍认同、一种升华的心境。《阿弗尔诺》其实是在寻求一种辨认丧失的不可逆性，这也正是科斯特洛所言格吕克持续“质疑与修正心理叙事”的体现^{[9]361}。

综而论之，《阿勒山》与《阿弗尔诺》中的苦修哀悼，通过拒斥自然意象与循环更新重塑了田园哀歌传统。以节制的措辞、简练的句法、神话的延宕，格吕克将悲恸转化为持存的伦理在场，强调丧失的不可逆性，而非传统的修复与时间闭合。

四、“不可能哀悼”的见证：格吕克挽歌的内在张力

在贝克对格吕克苦修诗学三分法中，第一种是“旨在抵御经验压力、塑造独立自我的弃绝之路”，其中“经验”指涉“他人、对他人的依赖、他人的索求”^{[1]134}。格吕克少女时期，此种弃绝在厌食症这种对他人干预的身体性拒斥中得以具像化，正如格吕克自述：“我分离自己、建立清晰边界的方式，是将自己置于他人声明的欲望之外，利用他们的意志来塑造我的意志”^{[12]10}。然而，成熟的格吕克重塑了此种苦修，使其不再成为是防御性的孤立，而成为一种有节律的接受力、一种为他人持续在场预留空间的苦修形式。如前所述，在《阿勒山》中，格吕克拒绝任何慰藉性替代，规避悲恸的象征中介（如姐姐以花卉纪念父亲）以保存丧失的伦理完整性。这呼应斯帕戈（Spargo）的论断：反哀歌抵制“存在于哀悼与表征的替代性联结之间、对死者施以慰藉性象征评估的倾向”^{[13]13}。《阿弗尔诺》则以珀耳塞福涅故事接纳了神话的替换手段。然此处的替代并非要让悲恸走向闭合，而是无限延宕其消解。神话的循环时间性践行着生与死间的永恒阈限，以其对终结的拒绝映照德里达的延异。

从《阿勒山》的拒绝到后“9·11”写作《阿弗尔诺》中象征性采纳的表层转向，与其说是对反哀歌精神的背离，不如说是其策略的扩展。它将我们带回开篇所述的临界空间：格吕克并非以替代消解创伤、慰藉死者，而是再造珀耳塞福涅神话以持存一个居间空间。形式上是替代，本质上却是反慰藉。此种哀悼中的策略性张力揭示出格吕克反哀歌的内在弹性，这是一种源于对他者伦理敞开性的弹性。借用德里达在《保罗·德曼的记忆》中的表述，哀悼者的任务被一种无可避免的疑难所标记：在试图通过记忆保存死者时，我们无可避免地将其内化，从而抹除其他异性。在“谟涅摩叙涅”（“Mnemosyne”）一章中，他这样论及哀悼行为：“何为不可能哀悼？关于记忆的本质，它告诉了我们什么？至于我们之中的他者，即使在此‘对他者的遥远预感’中，最不义的背叛位于何处？是最令人痛苦、甚至最致命的背信，在于那将死去他者的图像、偶像或理想内化于我们之中、使其仅活在我们之中的可能哀悼？还是那不可能哀悼——它让渡他者以他异性，尊重其无限远离，从而拒绝或无力将他人纳入自身，如同纳入某种自恋的坟墓或窖藏？”^{[14]6}

哀悼，本质上是一种悖论性表演，一种同时背叛与尊崇他者的不可能忠贞。此视角下，格吕克在《阿勒山》中对象征替代的拒斥，可被解读为对此种不可能性的坚持：通过拒绝花卉纪念，她抵制以慰藉性图像覆写丧恸的诱惑。她的缄默哀悼，事实上持守着死者所要求的伦理距离——其说话者“对维持花园纪念的漠不关心，展现了她对父亲的冷酷而诚实的评估”^{[2]184}。格吕克的苦修诗学、近乎生硬的书写方式，正揭示出她将沉默认定为“悲恸深度的证词”^{[2]182}。

格吕克曾自省：“我着迷于省略、未言、暗示、雄辩而蓄意的沉默。未言于我，施以巨大力量：我常希望整首诗能以此词汇构成”^{[12]73}。此种沉默与裸露深植于抒情的凝缩传统，也阐明了她在《阿弗尔诺》中的诗学实践：

诗作的措辞赤贫、质地精简，如她其他诗歌，功能如同废墟或不完整的艺术品，“它们萦绕人心，因其不圆满，而圆满被暗示”^{[12]73}。同理，她的哀悼并不解决，而是悬置于雄辩的沉默中，被缺席却隐含之物萦绕，双子塔的毁灭性袭击如幽灵般漂浮在读者眼前。对“9·11”的拒绝命名是对不可言说之物、一场过于灾难性的恐怖的回应。因此，《阿弗尔诺》中的神话转向并未否定这一伦理姿态，而是以不同模式将其戏剧化。格吕克以替代取代命名。她运用神话、半人半神的演说者、“与身体的分离”来言说不可言说之物^{[3]35}。通过呈现珀耳塞福涅在生死两界间的永恒穿行，格吕克将哀悼重新构想为一种如精灵般悬置于阈限的永恒状态。神话的功能正如德里达所称的幽灵——一个既象征失去、又暴露其不可跨越距离的补替。此意义上，格吕克的替代运用并未美化死亡，反而强化了这一历史悲剧作为他者的不可言说性。

从《阿勒山》到《阿弗尔诺》，格吕克将哀悼呈现为抗拒闭合的伦理遭遇。无论是通过拒绝还是神话延宕，她的反哀歌戏剧化了主体对他者缺席的脆弱性，践行一种暴露诗学——持守哀悼作为哀悼的不可能性，以此尊崇死者，拒绝将其同化入慰藉性表征。

五、结论：反挽歌作为诗歌媒介的伦理潜能

实际上，哀悼的不可能性触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文学作为通达现实的媒介。格吕克在《死亡与缺席》中提供了对其诗学媒介观的关键洞见，指出诗歌创作是积极在场，而非“镌刻于岩石”的静态铭文^{[12]128}。她论道：“诗歌并非作为客体而持久，而是作为在场。当你阅读任何值得记忆的文字，你解放了一个人的声音；你将一个陪伴的灵魂再次释放入世界。”^{[12]128}。这或许解释了为何她在《阿勒山》中以父亲（或叙述者之父）的方式哀悼。通过尊崇其在场，拒绝将其吸纳于“我”的哀悼方式，格吕克使哀悼者得以接触作为他者的他者，而非同化或美化丧失。通过这种方式，诗歌成为了一种媒介，哀悼在其中既未完成，也未获得象征性的解决，而是被中介化，维持着那种张力和矛盾，这些张力和矛盾正是她反哀悼式实践的特征。

然而，当面对“9·11”这一不可言说的历史浩劫时，格吕克开始质疑媒介本身：“的确，世上没有足够的美。/ 确实，我无力修复它”^{[10]498}。这正像 W. H. 奥登面对战争的集体苦难时在《纪念叶芝》中所写的那样：“诗歌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16]1473}。二者皆直面肖莎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和多里·劳布（Dori Laub）在《证词：见证的危机》（*Testimony: Crisis of Witnessing*）中定义的“无指涉物”（without referent）的事件——一种极端到逃逸表征的历史创伤^{[15]102}。极端创伤溢出语言，直接言说在恐怖重压下坍塌。然而，此时诗中的“人格面具”（即说话者）似乎化身为一位艺术家、一位诗人，宣称“既无坦诚可言，而在此我或能有所用……我 / 在工作，尽管我沉默”^{[10]498}。奥登也接着写道，诗歌“幸存”。在该组诗最后转向月亮的段落中，贝克将其解读为“格吕克苦修式艺术的缪斯，这种艺术旨在目睹幻觉被剥离后尚存之物”^{[11]140}。最终，格吕克的挽歌诗作并非以疗愈为目的，而是为集体的不可疗愈之物腾出空间——“你并不孤单，/ 那首诗说”^{[10]499}。

格吕克的诗学并不将诗歌视为一种能够抵消创伤与死亡的救赎性行为，而是将其看作一个临时的遭遇场域——在那里，那面色苍白、徘徊不去的他者的声音，纵然脆弱、破碎、断断续续，却仍可能被听见。通过识破感伤疗愈的幻象以及能指或文学再现的局限，格吕克以一种见证的形式向挽歌传统发起挑战：这种见证既不纪念，也不化解，而是将哀悼赤裸裸地悬置、延宕在一个阈限空间之中，置于那“黑暗的隧道”^{[10]499}里。她不寻求“一个主宰性的原动力”；相反，在这个居间的、近乎“存在主义—虚无主义”的空间中，她化身为见证并记录故事的“智者”，“一个存在意义上的创造者，等待着超越人类的暴力”^{[3]44}。换言之，格吕克重申：从创伤与暴行中获得救赎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于文学之中，存在于诗歌之中。

综观《阿勒山》与《阿弗尔诺》，格吕克的哀歌实践展现了一种独特的当代反哀歌形态，植根于哀悼与表征间的张力。通过对挽歌传统的重塑，格吕克的两部作品揭示了慰藉性表征的局限，摹画出哀悼的边界：《阿勒山》以简约措辞与直接经验语言演绎私人悲恸，抵制象征性的收束闭合，持守逝者他异性；其伦理承诺在于忠于他者，而非将逝去的他者同化入自我；《阿弗尔诺》则以迂回方式触及“9·11”集体创伤，神话置换与非线性叙事为其创造了一个居间空间，以斯多葛式的集体哀悼表达，保存了历史灾难的不可化约的他异性。借此，格吕克对哀歌传统的介入与对挽歌模式的挑战揭示了一种将艺术视为创伤媒介的矛盾态度，她既承认诗歌作为创伤见证的可能性，又不断质疑其表征效力，从而揭示符号在直面死亡与创伤时的局限——无论这种创伤是私人性的，还是公共、历史性的。

参考文献:

- [1] Baker, Robert. "Versions of Ascesis in Louise Glück's Poetry." *The Cambridge Quarterly*, vol. 47, no. 2, 2018, pp. 131-54.
- [2] Morris, Daniel. *The Poetry of Louise Glück: A Thematic Introduction*. U of Missouri P, 2006.
- [3] Azcu, Mary Kate. "Persona, Trauma and Survival in Louise Glück's Postmodern, Mythic, Twenty-First-Century 'October'." *Crisis and Contemporary Poetry*, edited by Ann Karhio, Sean Crosson, and Charles Armstrong, Macmillan, 2011, pp. 33-49.
- [4] Weisman, Karen, editor.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legy*. Oxford UP, 2010.
- [5] Ramazani, Jahan. *Poetry of Mourning: The Modern Elegy from Hardy to Heaney*. U of Chicago P, 1994.
- [6] Spargo, R. Clifton. "The Contemporary Anti-Eleg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legy*, edited by Karen Weisman, Oxford UP, 2010, pp. 444-61.
- [7] Watterson, William C. "Nation and History: The Emergence of the English Pastoral Eleg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legy*, edited by Karen Weisman, Oxford UP, 2010, pp. 145-62.
- [8] Hammond, Jeffrey. "New World Frontiers: The American Puritan Eleg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legy*, edited by Karen Weisman, Oxford UP, 2010, pp. 221-39.
- [9] Costello, Bonnie. "Fresh Woods: Elegy and Ecology among the Ruin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legy*, edited by Karen Weis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346-65.
- [10] Glück, Louise. *Poems 1962-2012*.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 [11] Dan, Hansong 但汉松. "暴力改变了我, 然后呢? ——格吕克《阿弗尔诺》中的后'9·11'悲悼." *外国文学*, no. 3, 2021, pp. 30-42.
- [12] Glück, Louise. *Proofs and Theories: Essays on Poetry*. Ecco Press, 1994.
- [13] Spargo, R. Clifton. *The Ethics of Mourning: Grief and Responsibility in Elegiac Literature*. Johns Hopkins UP, 2004.
- [14] Derrida, Jacques. *Memoires for Paul de Man*. Translated by Cecile Lindsay, Jonathan Culler, Eduardo Cadava, and Peggy Kamuf, Columbia UP, 1989.
- [15] Felman, Shoshana, and Dori Laub.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Routledge, 1992.
- [16] Ferguson, Margaret, et al.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Poetry, Fifth Edition*.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5.

Louise Glück's Anti-Elegy in *Ararat* and *Averno*

Jiang Hanwei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contemporary writing of elegy, Louise Glück's postmodern mourning is tinged with her stoic poetics of austerity. Her poems dismantle traditional elegiac forms by refusing both consolation and lyric sentimentality. This paper seeks to explore such an elegiac writing through her mourning in collections *Ararat* (1990), one of Louise Glück's most autobiographical collections on familial tensions, and *Averno* (2006), a post-9/11 volume in which individual trauma swells into that of a communal one. Rather than presenting trauma as a narrative of personal triumph or growth, *Ararat* and *Averno* both mourn through the refusal to deny trauma in different ways—bareness and substitution, tracing death and the violence embedded in it and deeming trauma as an immutable fact. Thus, the Romanticist's transcendence remains deferred, not realized in her mourning. Ultimately, Glück's elegiac poems function not to heal, but to hold space for the unhealable. By seeing through the illusions of sentimental healing, Glück challenges the elegiac tradition in a form of witness: one that neither commemorates nor resolves, but starkly defers and suspends.

Keywords: Louise Glück; mourning; (anti-)elegy; memory